

百种语文

小丛书 曹先擢 主编



汉语修辞文化

HANYU XIUCI
WENHUA

张炼强 著

语文出版社
<http://www.ywcbs.com>

百种语文小丛书

HANYU XIUCI WENHUA

汉语修辞文化

张炼强 著

YUWEN CHUBANSHE

语文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	(1)
一、什么是汉语修辞文化	(1)
二、怎样观察汉语修辞文化	(5)
第二章 汉语修辞与汉民族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	(17)
一、汉语修辞对汉民族思维方式的反映	(17)
二、汉语修辞对汉民族心理特征的反映	(22)
第三章 汉语修辞与儒道佛文化	(34)
一、汉语修辞与儒家文化	(34)
二、汉语修辞与道家文化	(41)
三、汉语修辞与佛教文化	(45)
第四章 汉语修辞与衣、食、住、行文化	(51)
一、汉语修辞与衣文化	(51)
二、汉语修辞与食文化	(54)
三、汉语修辞与住文化	(59)
四、汉语修辞与行文化	(62)

第五章 汉语修辞与其他文化现象…………… (64)

- 一、汉语修辞与官场规制、考试制度、
币制沿革、婚姻习俗等文化现象…………… (64)
- 二、汉语修辞与汉字文化底蕴…………… (67)

第六章 汉语修辞的输出、吸收与发展…………… (69)

- 一、汉语修辞的输出…………… (69)
- 二、汉语对外语修辞的吸收…………… (70)
- 三、汉民族文化的发展变化促进汉语修辞
的发展变化…………… (77)

第一章 引言

一、什么是汉语修辞文化

(一) 修辞和文化的界说

要弄清楚什么是汉语修辞文化，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修辞，什么是文化，修辞同文化有什么联系，然后进一步弄清楚汉语修辞与汉民族文化有什么关系。

适应具体的题旨、情境，根据不同的表达需要，运用最恰当的语言表达方式，以求得最好的交际效果的言语活动，就是修辞。修辞就是在上述各种条件下的语言运用。

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特指社会意识形态”（《辞源》）。如果要作更具体一些理解，可以参考这样的界说：“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在劳动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则指社会特定发展阶段上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陈松岑《社会语言学导论》，5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如此说来，哲学

思想、思维方式、心理特征、审美观点、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政治体制、典章制度、社会组织、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以及语言本身，都是文化现象，都属于文化的范畴。而文化又往往同民族联系在一起，因为共同的文化是民族的主要特征之一，同一个民族创造和拥有共同的文化，构成民族文化。

（二）汉语修辞和汉民族文化的关系

如上所述，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一种交际工具、一种思维工具，无一不同文化相联系。语言本身是一种文化现象，同时又是其他文化现象的主要载体，因为离开了语言，许多文化现象往往失去了载体而无从体现。当然，离开了文化现象，语言也就失去了负载的内容。罗常培说：“一时代的客观社会生活，决定了那时代的语言内容；也可以说，语言的内容是在足以反映出某一时代社会生活的各面影。社会的现象，由经济生活到全部社会意识，都沉淀在语言里面。”（罗常培《语言与文化》，88页，语文出版社，1989）典型的例证如：“云南丽江地区的纳西语中‘夫妻’这个词是 [n̩invəkæ]，直译成汉语是‘妻子丈夫’；‘男女’这个词是 [mizo]，直译成汉语是‘女男’……，它反映了母权社会时期女性地位较高的特点，……”（陈松岑《社会语言学导论》，65页）

而汉语则不说“妻夫”、“妇夫”，而说“夫妻”、“夫妇”，不说“妻夫店”，而说“夫妻店”，不说“两婆公”，而说“两公婆”，不说“女男”，而说“男女”，不说“女男平等”、“女男有别”、“女男合校”、“不女不男”、“半女一男”，而说“男女平等”、“男女有别”、“男女合校”、“不男不女”、“一男半女”。汉语的这种语序，除了受调协平仄的制约之外，应该说是汉民族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形成的夫为妻纲、重男轻女的观念的一种反映。

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修辞是语言的运用。也就是说，修辞的基础是语言，修辞具有一定的文化底蕴（或者说“文化内涵”）。而且在运用语言的时候，不能孤立地追求语言运用的技巧，必须适应题旨、情境和表达需要。而这种适应往往反映了某种文化，获得了某种文化底蕴。修辞还不但反映文化，而且也作用于文化，对文化起传扬、巩固的作用。比如要表达“第一遭”、“头一回”的意思，可以直白如实说，也可以用比喻说“破题儿第一遭”，用歇后语说“大姑娘坐花轿——头一回”。前者是明清封建科举制度的文化反映，那时要做八股文、考八股文，八股文开头第一段叫“破题”，所以用“破题儿”比喻“第一遭”；后者是旧时婚嫁习俗的文化反映，那时女子出嫁要坐着花轿到婆家，所以用“头一回”作为“大姑娘坐花轿”的歇后部分。

这些修辞现象，反映了明清封建科举制度和旧时婚嫁习俗。

可见修辞同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不过，这种联系，具体到一个词语，一种修辞现象，可以或强或弱，或显或隐，甚至或有或无。其文化底蕴有时存在于系列的语言现象之中，只从只言片语不易看出，有时也不是从语言的表层如词语的运用可以直接看到的。为此，我们不必认为任何一个词语、任何一种修辞现象都内含一定的文化底蕴。比方我们不必一定要从“这个好，那个坏”这句话中寻找“这个”、“那个”、“好”、“坏”等词语内含什么文化底蕴，也不必一定要从“这个像大象，那个像老虎”的比喻中寻找它内含什么文化底蕴。但是，这又并不妨碍我们认定语言、修辞从总体上说，从本质上说，同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语言和以语言的运用为基础的修辞，本身是一种文化现象，同时也是其他文化现象的主要载体。

汉语修辞同汉民族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修辞同文化密切联系的具体体现。因此汉语的修辞文化，也就是指汉语修辞现象的汉民族文化底蕴或者说文化内涵。当然也并非同一民族的所有成员所具有的民族文化素养都毫无差别，因而他们对修辞现象的文化底蕴的理解和把握都完全相同。可以说，“鸿儒”和“白丁”对反映儒家思想的修辞现象的

文化底蕴在理解和把握上都是有差异的。

二、怎样观察汉语修辞文化

我们认为，应从大处着眼，即从如下三方面来观察。

(一) 从中华民族文化的高度观察

就中国境内各民族以及海外华人而言，他们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各自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汉民族在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进程中，起了主导作用，成了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民族文化，成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汉语也成了国内各民族的通用语。就世界范围内各民族而言，以汉民族为主体民族的中华民族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以其历史悠久、光辉灿烂的文化对世界文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汉语也成为当今世界上几种主要的国际通用语言之一。

我们应该站在这个高度上来观察汉语修辞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摆正汉语修辞文化在国内外的地位，才能面对现实，审时制宜，才能回顾历史，探源溯流。

(二) 从同其他民族修辞文化的比较中观察

1. 相互不同

汉语修辞文化是同其他民族的修辞文化相区别

而存在和显现的。要弄清汉语修辞文化的主要特点就要知己知彼。杨树达和张志公都强调汉语修辞文化有自身的特点，不能同其他民族的修辞文化混而为一。杨树达说：“若夫修辞之事，乃欲冀文辞之美，与治文法惟求达者殊科。族姓不同，则其所以求美之术自异。况在华夏，历古以尚文为治，而谓其修辞之术与欧洲为一源，不亦诬乎？昧者顾取彼族之所为——袭之，彼之所有，则我必具，彼之所缺，则我不能独有，其贬己媚人，不已甚乎！”（杨树达《中国修辞学自序》）张志公说：“如果说，在语法学方面，由于我们的汉语有不同于西方语言的特点，照搬别人的东西是不可取的，那末，在修辞学方面，就不仅有语言特点的问题，还有多方面文化传统的特点包含于其中，照搬更不可取。”（张志公《〈修辞学发凡〉给我的教益》）杨树达从华夏历古以尚文为治、文化背景不同于欧美民族，修辞的任务在于冀文辞之美，而民族不同，求美之术自然有所不同诸方面，强调了汉语修辞文化的特点；张志公从汉语具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语言的特点和汉语修辞包含着多方面的汉民族文化传统两个方面强调了汉语修辞文化的特点。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

这里不妨对汉语修辞文化探源溯流，以之作为佐证。汉民族文化源远流长。汉语和汉语修辞现象

作为汉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和交流、传播的中介，同样源远流长。未有汉字之前，也就是汉语书面语言出现之前，汉语修辞现象，我们无从看到，汉字产生之后，我们从我国最早的书面语言中看到了汉语修辞现象。甲骨刻辞所记录的汉语修辞现象就有比喻、排比、设问等等，其中有的明显地内含汉民族文化底蕴。例如：“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郭沫若《卜辞通纂》，375）这是由四个疑问句构成的排比句。内含着殷人尚鬼，行事卜于鬼神的文化习俗和运用语言要求整齐有序的心理特征。这些文化习俗和心理特征，作为修辞的文化底蕴，是我们祖先的独特创造，绝不是与“欧洲为一源”的。

2. 异中有同

我们也应该看到，各民族的修辞文化，也不是绝对排他的，也可以有相近或相同之处。各民族的语言是不同的，各民族的文化是适应本民族的社会生活而形成的，是一个相对完整、独立的实体，因而也是不同的。但是，我们不能否定世界不同民族的语言存在着某些共性，也不能否定世界不同民族的生存环境、社会结构、思维方式、心理特征、审美情趣、风俗习惯等等也可以有相近或相同之处。所以，从修辞文化来说，汉语修辞文化同其他民族的修辞文化是异中有同的。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因此，如果不同的民族所处的时代的条件相同，认识可能相近或相同，语言和修辞对此作出的反映就可能相近或相同。现成的例子，可以举有关“马”的语言现象和修辞现象。“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凡是社会劳动主要处于手工劳动的条件时，马作为役畜曾经得到广泛的应用。直到不久以前，表达机械力的单位还是沿用‘马力’（horse-power）这样的单位——现代汉语中的‘马力’一词，是从西方语言中照字直译过来的。”（陈原《社会语言学》，51页，学林出版社，1983）正因为如此，汉语修辞中用作为役畜的马作比喻的比比皆是，诸如“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君子一言，快马一鞭”、“车如流水马如龙”之类。“马力”一词的科学界说是：“工程上曾用的功率单位，1‘米制马力’=754克·米/秒=735.499瓦。马力单位来源于英国煤矿中用马来抽水时一匹马发出的功率。瓦特曾提出用一匹马发出的功率来做动力的单位。”（许国保、王福山主编《简明物理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我们当然不能说汉语的这些修辞现象是受到“horse-power”（马力）一词的启发而产生的，“马如龙”的比喻，早见于南唐李煜的词，

更谈不到这一点。我们只能说，这些修辞现象是在汉民族生存的时代的条件下的产物。汉民族和英语民族在“马力”这一语言观象上有相通之处，不是相约而同，而是不约而同。这是两个不同民族在这一方面具有相同的时代条件的产物。

但是这个问题又不能机械地理解。正如张志公所说的：“总之，研究修辞学要注意到修辞有民族性、社会性、时代性。当然，我们得不出某民族必然有某种修辞风尚，某种社会因素必然产生某种修辞因素，某时代必然有某种修辞方式方法的各种‘公式’。”（张志公《汉语修辞概说》）因为修辞现象除了受到社会诸条件的制约，还受到语言和修辞自身的规律等种种因素的制约，制约的条件有种种不同，修辞现象和社会条件之间也就不能是简单的一对一的对应了。比如汉语修辞有用足球比赛“亮黄牌”比喻提出警告，而其他民族不一定有这种修辞现象，尽管各民族在这一方面面对的是同一事实。

不同的民族在某些方面也具有相同的心态。正如孟子所说的，“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孟子·告子上》）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比如在避俗求雅方面，汉人英人心理上有相近之

处。汉人一般不直白说出不雅的身体部位，而使用讳饰，如把外生殖器说成“阴部”、“下身”。与此相类，英人避免直白说出“ass”（驴），而把“ass”称为“donkey”。“早在1751年左右，有教养的淑女们在任何场合下都不愿说‘驴’这个词（ass）。原因是‘ass’这一词当时的发音和表示臀部的“arse”一样。因此，人们为这一动物起了另一个名字：‘donkey’。”（傅惟慈、沈叙伦《浅谈禁忌词语与委婉词语》，《语言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2期）

不同民族在某些方面也可以具有共同的审美情趣。比如汉人和西方人都以女子腰细为美，因而中外女子不少人有节食细腰的美容举措。在中国古代，有所谓“楚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韩非子·二柄》）和“未知歌舞能多少，虚减宫厨为细腰”（李商隐《梦泽》）的说法。与此相应的修辞现象汉语就有“楚腰纤细掌中轻”（杜牧《遣怀》）的形容描写，有“柳腰”的比喻。“柳腰”是用杨柳枝条纤细柔弱、婀娜多姿的形象比喻女子的纤细腰肢的轻盈美质美态。这些修辞现象，如果译成外语，由于中外审美情趣相近，外族人是比较容易获得其概念语义和美学信息的，不需要经过文化底蕴的注释和转换。

汉语早就有“兴”的修辞现象。所谓“兴”，

朱熹解释作“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朱熹《诗集传·〈关雎〉篇注》）姚际恒解释作“兴者，但借物以起兴，不必与正意相关也。”（姚际恒《诗经通论》）夏传才指出，姚际恒“认为起兴与正意的关系，有的与正意相关，有的与正意不相关；不相关的只是借物而兴起下文，相关的都兼有比。这个看法是符合《诗经》实际情况的。”（夏传才《诗经语言艺术》，91页，语文出版社，1985）与正意相关的，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诗经·周南·桃夭》）诗用桃花起兴，因桃花最为艳丽，所以又用桃花比喻新娘的姣美的容貌。与正意不相关的，如“阪有漆，隍有栗。既见君子，并坐鼓瑟。今者不乐，逝者其耄。阪有桑，隍有杨。既见君子，并坐鼓簧。今者不乐，逝者其亡。”（《诗经·秦风·车邻》）夏传才说：“全诗的主题是劝人及时行乐，这和阪的漆、桑、隍的栗、杨，都没有意义上的联系，它们发端起情，引起下文的所咏之辞，最主要的是起定韵作用。”（夏传才《诗经语言艺术》，95页）可以说，与正意不相关的“兴”，是无补于义而有益于韵的。它能增强诗歌的韵律美，这当然也内含着汉族人的审美情趣。

“兴”作为一种修辞手法由古至今长用不衰。在现代诗歌，尤其是民歌、儿歌中，无论是与正意

相关的，还是与正意不相关的，都并不少见。前者如：“山丹丹开花红绞绞，香香人才长得好。”（李季《王贵与李香香》）“树梢树枝树根根，亲山亲水有亲人。”（贺敬之《回延安》）花好与人好，树的梢、枝、根相连与人、山、水的相亲，与正意相关。后者如：“延水浊，延水清，情郎哥哥去当兵。当兵要当抗日军，不是好铁不打钉。延水清，延水浊，小妹妹来送情郎哥。哥哥你出乡去打仗，要和鬼子拼死活。”（熊复《延水谣》歌词）。“一二三四五，山上打老虎”。（儿歌）“清”与“钉”为韵，“浊”与“活”为韵，“五”与“虎”为韵，其“兴”主要起定韵作用，无补于义而有益于韵，与正意不相关。

根据朱自清的统计，《诗经》305篇中，经《毛传》注明“兴也”的就有116篇，而其中与正意不相关的也为数不少。其后的诗歌、儿歌也常用这一类“兴”。这反映了汉民族对这一类“兴”的浓郁的审美情趣。

“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英语世界也有与汉语的“兴”相近的修辞现象。请看钱钟书的举例和说明：“闻寓楼庭院中六七岁小儿聚戏歌云：‘一二一，一二一，香蕉苹果大鸭梨，我吃苹果你吃梨’；……偶睹西报载纽约民众示威大呼云：‘一二三四，战争停止，五六七八，政府倒塌！’”（One

two three four, /We don't want the war! /Five six seven eight, /We don't want the state!) ……一三三四等……殆六义之‘兴’矣。”（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64页，中华书局，1979）由于在“兴”的方面汉人英人的审美情趣有相近之处，所以才有如此相同的修辞现象。

各民族语言可谓千差万别，但在某些方面有一些共同之处，也是事实。比如不少语言都有 SVO 的语序，因而体现在 SVO 语序上的某些句式修辞现象就有可能相近。请看高名凯的举例和说明：“句子和句子也可以并列起来，例如：……英语的 he likes me and I like him; ……这种并列关系，在汉语方面特别的多，因为中国人喜欢对对子，对对子就是把两个句子并列起来。”（高名凯《普通语言学》下册，220页，东方书店，1955）也就是说，由于汉语和英语都有 SVO 语序的句子结构，所以有这样相近的句式修辞的事实。

使用附加问句，能使问话变得委婉一些。这是汉语和英语相同的。比如“不直接说：‘John is here’（约翰在这儿）而是说：‘John is here, isn't he?’（约翰在这儿，不是吗？）”（陈松岑《社会语言学导论》，119页。）这不能不说这是汉英共有的句式修辞现象。

汉语修辞同其他民族修辞相近相同之处，此外